

ISSN 1996-2541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

Journal of Humanity Resources

半年刊

Number 14, November 2013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本期主題

- 文化資源研究
- 社會資源研究
- 歷史資源研究
- 政治資源研究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文資源研究學會 發行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Yan'an

Warren K. S.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hih Chien University Kaohsiung Campus

Abstract

This study look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to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 Mao Zedong,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Yan'an (1942-45). Mao, on the one hand, foster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u, through whom to launch attacks on Zhou and cleverly creates conflicts between Liu and Zhou. On the other hand, Mao keeps Zhou close in order to make use of Zhou's talent. The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is Mao's typical tactic and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and Zhou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Yan'an.

Keywords: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Yan'an, Mao Zedong, Liu Shaoqi, Zhou Enlai,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Liu and Zhou, Guanxi

中國大陸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認知與因應

張裕亮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學術界認知的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絕大多數援引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建構主義，少數援引的研究途徑則為新制度主義、後功能主義。同時，從中國學術界有關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因應論述，明顯有其「條件」，一方面中國肯定歐洲區域整合獲致的結果，認為可作為東亞尚未統一國家的歷史借鏡經驗，但反對歐盟以「規範性力量歐洲」作為「普世」的意識型態工具，強行施加他國。

關鍵詞：歐盟、歐洲認同、歐洲區域整合、建構主義

壹、前言

從上個世紀 50 年代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進而啟動的歐洲區域整合進程，在經歷了歐洲單一市場、統一貨幣、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歐盟公民權、共同的象徵符號歐盟盟旗等一系列具有超國家意義的過程中，自然觸及有關歐洲認同的議題，並成為國際關係學界關注的焦點。

歐洲認同作為一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歐盟官方文件中是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初。當時因為石油危機爆發，歐洲區域整合正值困難時期，為了推動歐洲政治合作機制的建設，在 1973 年 12 月 14 日舉行的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EC) 9 國外長高峰會議上，制定《關於歐洲認同的文件》，因為它有助於歐洲共同體更好地界定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及歐洲共同體在世界事務中的責任和地位¹。2003 年伊拉克戰爭前後，由於對是否支持或反對美國對伊動武上面臨分裂局面，當代德國大思想家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聯合著名學者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共同發表了《論歐洲的復興》一文，號召歐洲人團結起來，要求歐洲各成員國要形成共同意識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他們的民族認同，增加歐洲這一向度。就是說要建構一個歐洲認同²。

由於歐洲認同的形成對歐洲區域整合具備了兩個作用，它有利於培養一種共同體意識，從而使歐盟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同時提高了歐盟的政治合法性。而歐洲區域整合的議題一向為中國學術界長期關注。本文即試圖論證中國學術界對於歐洲區域整合認同的認知，是採用何種研究途徑？不同的研究途徑各有其優劣得失？同時，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因應論述為何？

貳、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認同論述

認同 (identity)一詞，源自於社會心理學，其定義可概括為在某種情境下，行為體在與「他者」 (others)的比較中，產生的一種自我認知和自我界定。認同也可以說是行為體的自我影像 (self-image)。文化研究學者霍爾 (Stuart Hall) 認為：「認同是通過差異建構的，……只有借助與他者的關係，表明某個術語不是什麼，明確缺少什麼，是什麼組成了它的外部這些積極的層面，只有這樣認同才能被建立起來。」³

認同是指人類從自出發，經過與「他者」的參照、比較，最終關照自身的認知過程和結果，包含了個體認同 (individual identity) 及集體認同 (collective identity)。個體認同探討的是「我是誰？」的問題，集體認同探討的就是「我們是誰？」的問題。集體認同包含了 2 個因素：1. 團體內 (in-group) 屬於該共同體的一種成員資格。這種成員資格往往是共同體成員間的精神紐帶，成員通過這種

¹ 李明，「歐盟認同與歐盟制度建設：一個互構進程」，《外交評論》，總第 98 期 (2007 年 10 月)，頁 30-31。

² 哈伯馬斯、德里達，「論歐洲的復興」，童世駿、曹衛東編，《老歐洲、新歐洲：911 以來歐洲復興思想對英美單邊主義的批判》(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88。

³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 p. 4.

紐帶，形成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2. 團體外 (out-group) 與我們不同的「他者」的存在。任何共同體都是和其他共同體的比較中認識自身的。所以，對內，集體認同能夠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是一個共同體社會的凝聚力所在。對外，集體認同能夠設立明確的邊界，從而被外界認可為一個統一的整體⁴。

歐洲認同既是集體層面上的歐洲整體自我認同，也是個人層面上個體歐洲人的社會認同。這兩者的形成均與「他者」的存在緊密相關。在歐洲認同的建立過程中存在許多「他者」，美國就是其中之一。

一、新現實主義

1970 年代新現實主義學者華茲 (Kenneth Waltz) 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主因在於國際體系的因素，而國際體系又是以國家間權力的分配為主要癥結。在國際無政府態度下，普遍的不安全感將促使國家尋求生存。華茲援引新現實主義理論，進一步解釋歐洲區域整合何以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沒有取得重大進展，關鍵在於區域整合意味著專業分工，對於國際體系的基本單元即國家，特別是小國來說，專業分工只能增加其對他國的依賴，這對於處於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將生存、安全和自主作為首要目標的國家來說是不可取的⁵。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

國際關係理論的新自由制度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理論，簡稱為新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從 1980 年代中期以來逐漸發展成熟。以柯爾翰為 (Robert O. Keohane) 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新現實主義太過於強調國際政治衝突面，忽略了國際制度化的事實。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存在無數的慣例、規範、原則、體制和國際關係的運作，並影響國際的行為模式⁶。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兩位學者柯爾翰 (Robert O. Keohane) 與奈伊 (Joseph Nye) 兩人強調互賴 (interdependence)、制度 (institution) 等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更提出複合互賴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的概念，指出國際社會中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各自的重要性，彼此連結性程度逐漸密切，各種國際議題越來越為複雜而難以區分為高階或低階之分⁷。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國際體系並沒有如同現實主義描述的如此悲觀，規範仍有其作用空間並替我們生活帶來穩定與和平之處。

三、建構主義

⁴ 李明，「試析一體化進程中的歐洲認同」，《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 (2003 年)，頁 19。

⁵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88-101; 中文版參見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22-127。

⁶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36 卷 12 期 (1997 年 12 月)，頁 2-6。

⁷ 陳欣之，「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收錄於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 年)，頁 90-93。

建構主義採取了不同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者對於規範的理解方式，社會建構主義著眼於強調認同 (identity)的重要性，認同意指一種主體或是單位層次的特徵，根植於行為體本身的自我領悟⁸。

依照國際關係學者溫特 (Alexander Wendt)的說明：「建構主義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有著以下的核心主張：(1)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2)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的，而不是物質性的。(3)國家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國家體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構成。從上述溫特的說明可以理解到，溫特的建構主義核心分析單位為國家，國家間的相互主體性而非國家利益構成了國際體系，國家的相互主體性決定了其認同，國家的認同會影響其對利益的判斷，對利益判斷的改變行為跟著轉變，國家間的相互主體性即是建構主義的簡要核心論點。⁹

同時，社會建構主義也提出內化 (internalization)等說明多種國際文化並存的現象，內化意指某種規範成為自我認同的程度的高低，從此說明國家對規範與規則遵守之間態度的轉換原因为何。內化影響國家交往時的行為取向，而國家交往互動時又會相互影響其對規範與規則的遵守，使得國家行為轉變。這部份的關鍵有四種變因：(1)互賴，依靠互賴形成新的集體認同，透過長期的相互合作形成的其他行為者的信任感，集體認同得以產生。(2)共同命運，群體面對共同的外來威脅，形成休戚與共的認知時，共同命運得以因應而生，但這有賴第三者威脅的出現。(3)同質性，關係著國家類型的相似程度，國家會因為對相似程度的高低而影響其如何認定國家間的合作關係。(4)主觀自我約束，國家自覺性遵循國際社會的既存規範，且單方面減輕其具有威脅性的行為造成他國的憂心，根本的將約束內化到最高層次，使得國家相信自身需求會受到重視，也不會遭受其他國家的併吞威脅。互賴、共同命運、同質性與主觀自我約束等四種因素相互結合，才能產生利他的集體性自我認同¹⁰。

參、歐洲區域整合研究的認同論述

一、新制度主義

1980年代在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歐洲整合的解釋過程中，國際制度理論演化出3個分支：1.理性選擇的制度主義 (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認為制度會影響國家對成本收益的判斷，使得它們更容易看到共同利益，更傾向於合作；2.歷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認為國際制度建立之初可能如現實主義所認為的只是有關國家追求共同利益的工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會越來越脫離成員國的控制，獲得越來越大的獨立性，成員國控制和國際制度獨立間的裂溝會越來越大。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是歷史制度主義的主要理論假設；3.社會學的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對制度的界定更寬廣，包括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規範，它與建構主義較為接近，都認為規則、規範塑造行為

⁸ 同上註，頁82-86。

⁹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8卷9期（1999年9月），頁93-109。

¹⁰ 陳欣之著，「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前引書，頁110-111；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前引文，頁93-109。

為體，影響行為體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中的行為方式¹¹。

中國學者范勇鵬即援引新制度主義理論，作為解釋歐洲認同的形成。新制度主義具備下列共同特徵：1.它們以結構主義為理論的出發點；2.它們認為制度的存在影響個人行為，並使行為具有可預測性；3.它們假設制度在其成員中塑造、改變文化和規則。¹²以馬奇 (J. G. March)和奧爾森 (J. P. Olsen)為代表的制度理論學者，即認為人類行為的偏好是內生的，其產生和改變都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而非如理性選擇理論假設是外生給定的。¹³

二、新功能主義、後功能主義

英國社會學者密特蘭尼 (David Mitrany)基於省思二戰後歐洲各民族國家肇因的戰爭原因，提出功能主義。然而伴隨著歐盟統合的實踐經驗，說明功能主義無法充分解釋歐盟統合的現象。為此，學者哈斯 (Ernst B. Haas)將功能主義加以修正，降低其規範的成分使之更符合科學化的要求，提出所謂的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以為因應，希望能夠解釋和預測歐洲的整合過程。¹⁴

中國學者李明指出，隨著冷戰後歐洲區域整合的深入拓展，學者日益感到原先那些宏大的區域整合理論，如新功能主義、自由政府間主義等已經難以解釋區域整合發展的新現實。特別是由於歐洲區域整合逐漸深入國內政治的層面，一直以來主要由精英驅動的區域整合模式變得障礙重重。而冷戰後的數次歐洲全民公決使得長期受到忽視的國內政黨政治、成員國大眾意見等開始佔據歐洲政治舞臺的核心位置。這些新現象的產生促使歐洲研究的學者考慮為歐洲區域整合研究設定新的理論議程，以解釋和引導歐洲區域整合實踐及其研究的進一步發展。2009年初，霍克 (Liesbet Hooghe)和馬科斯 (Gary Marks)兩位學者在他們多年研究歐盟政黨政治、大眾意見和多層治理模式的基礎上，通過對新功能主義等理論的修正，提出了歐洲區域整合的「後功能主義理論」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該理論為未來的歐洲區域整合理論發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議程和方向，其學術意義非常重要。¹⁵

三、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是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的國際關係理論，並從90年代後期開始轉向歐洲區域整合研究。建構主義將歐洲區域整合視為一個新政體的形成過程，認為在這個過程中，行為體(國家、社會團體和個人)的身分、偏好和行為方式都會發生變化。建構主義學者強調，這些關於身分、利益或偏好的變化，往往被理性主義所忽視，因此分析、解釋歐洲區域整合作為一個新政體的形成過程，以及

¹¹ 陳玉剛，「歐洲制憲與歐洲一體化：國際關係的解讀」，《歐洲》，第5期（2000年），頁14。

¹²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¹³ J. G. March and J. P. Olse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Vol. 9, No.3 (1996), pp. 247-264.

¹⁴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ity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4 (1969), pp. 161-166.

¹⁵ 李明，「後功能主義理論與歐洲一體化」，《歐洲研究》，第4期（2009年），頁33-34。

它所帶來的變革性變化，正是建構主義研究歐洲區域整合的目標。¹⁶

建構主義學派是從 2 個共同理論基點出發。首先，建構主義強調社會本體論。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只是物質因素，也有觀念因素。建構主義研究的人類意識問題和觀念因素，包括主體間意識、規範、規則、制度、通常程序的實踐、話語、交流行為、集體認同(身份)的形成、國家文化等。其次，建構主義採取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建構主義強調結構和行為體的相互建構作用。行為體的身份、偏好和行為都是受社會環境(主要由觀念構成)影響，即結構建構了行為體。同時，行為體通過日常的實踐創造、再現和改變著社會環境。¹⁷

中國學者李明輝援引建構主義，從強調社會本體論以及採取結構主義的方法論證這 2 個共同理論基點出發，建立了建構主義區域整合研究的分析框架。建構主義區域整合理論的分析框架可以總結為以下 3 個部分：第一、歐盟制度的作用；第二、政治共同體和身分的形成；第三、交往和話語的作用。¹⁸

四、超國家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多元主義

超國家主義者認為，一個統一的「新歐洲」必然取代現有的民族國家的地位。歐洲認同作為一種正在發展中的超國家認同屬於未來，而民族認同則屬於過去。新功能主義的代表哈斯 (Ernst B.Haas)指出，隨著外溢功能從經濟和技術領域向政治領域的擴散，人們原有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效忠將向超國家機構轉移。按照新功能主義的理論邏輯，歐盟是對民族國家的超越。近年來伴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超國家主義再次抬頭。一些支持超國家主義的西歐人士認為，歐洲整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和認同提出了最為強烈的挑戰，歐盟這樣的區域組織將取代民族國家，成為新的「命運共同體」¹⁹。

國家中心主義者持有與超國家主義者針鋒相對的立場。他們對超國家認同將取代民族認同的觀點深表懷疑，強調歐洲認同和民族認同之間確實構成一種競爭關係，更宣稱歐洲認同只不過是一種想像，難以成為現實。著名民族主義學者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指出，由於歐洲認同缺乏民族認同所具有來自於廣大民眾的情感層面，缺乏共有的集體記憶、象徵符號和神話，所以在內容上歐洲認同是虛幻的、空洞的。史密斯並以冷戰後全球民族主義的復興為例，指出和其他集體認同形式如階級認同、宗教認同相比，民族認同更有生命力²⁰。

在相互對立的超國家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之外，一種多元主義的思想逐漸流行起來。多元主義反對歐洲認同和民族認同之間是相互競爭、相互衝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觀點，聲稱歐洲認同和民族認同之間是一種多元共存的關係，兩者相互兼

¹⁶ 李明輝，「建構主義的歐洲一體化理論探析」，《歐洲研究》，第 3 期（2003 年），頁 49-50。

¹⁷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http://www.fu-berlin.de/atasp>.

¹⁸ 李明輝，「建構主義的歐洲一體化理論探析」，前引文，頁 52。

¹⁹ 李明輝，「試析歐洲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歐洲研究》，第 3 期（2005 年），頁 87-88。

²⁰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1(Jan., 1992), pp. 55-76; 李明輝，「試析歐洲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前引文，頁 88-90。

容且功能互補，在歐洲認同逐漸成為一個現實的同時，民族認同不會消亡。²¹

肆、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認知論述

關於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中國大陸學者論述的角度或有所不同，包括純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包括了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權力/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權力/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大體上，根據本研究蒐集的中國學術界論文顯示，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都是純粹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援引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建構主義，少數論文援引的研究途徑則為新制度主義、後功能主義。而這也說明了當前中國學術界對於援引建構主義，論證歐洲區域整合有其相當程度掌握。

一、純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

中國學者抱持純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之論述，大體上認為歐洲區域整合經歷了歐盟盟旗、盟歌、護照的制定、歐盟公民權的誕生、歐洲公民社會權利的改善等、歐洲媒介系統的建立、歐洲年輕一代大眾教育的強化等整合措施，逐步促進了認同。但是中國學者的論述也指出，在上述多項歐洲區域整合措施中，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減緩了歐洲認同建構的速度與成效。

首先，在歐盟公民權與歐洲認同上，中國學者馬勝利在「歐盟公民權與歐洲認同」一文中指出，1991 年 12 月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宣佈建立歐盟公民權，標誌著歐盟公民權的誕生。歐盟公民權是歐洲認同的重要內容與顯著標誌²²。事實上，在歐盟東擴過程中，歐盟制訂了很多標準和規範來確定候選國資格，而東歐國家也在冷戰後提出了「回歸歐洲」口號，通過一系列改革來滿足歐盟的成員資格要求，力求獲得這種「歐洲認同」²³。但馬勝利也指出，由於歐盟公民權「自上而下」產生的，仍缺乏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公民權；加上歐盟個別法案與各國公民具體權利抵觸等，使得歐盟公民權的普遍落實仍需努力，進而影響到歐洲認同的建構。

其次，談到社會層面的歐洲認同建構，中國學者田德文在「論社會層面上的歐洲認同建構」指出，認為認同建構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目前歐洲人對於歐盟較低的認同度，說明歐盟需要在社會層面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田德文指出，要達到在社會層面增強歐洲認同的目的，可以通過不斷完善共同體社會政策體系，例如在教育制度、移民問題、減少失業、健保制度、住房、養老金等，建構歐洲公民社會權利的概念，將維護歐洲社會價值的觀念落實到公民個人層面²⁴。

第三，有關文化認同與歐洲區域整合，張旭鵬在「文化認同理論與歐洲一體化」一文中指出，文化認同是歐洲區域整合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概念，它增強了對歐洲這一特定地理區域和文化政治實體的認同意識，不僅為歐洲公民接受政治經

²¹ 同註 19，頁 90-91。

²² 馬勝利，「歐盟公民權與歐洲認同」，《歐洲研究》，第 1 期（2008 年），頁 30。

²³ 李明輝，「試析歐洲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前引文，頁 84。

²⁴ 田德文，「論社會層面上的歐洲認同建構」，《歐洲研究》，第 1 期（2008 年），頁 47-48。

濟統一的現實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礎，也影響和制約著歐洲區域整合的未來進展。然而在民族國家觀念依然盛行的今天，文化認同更多指向民族層面，以歐洲為價值核心和基礎的文化認同感相對薄弱。²⁵

張旭鵬在文中指出，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文化認同在其中的作用是相當關鍵的。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起，歐盟就開始調整其文化政策，為建構歐洲文化認同而努力。在 20 多年的實踐中，歐盟對歐洲文化認同的構建大致集中體現在以下 3 個方面：1. 對歐洲共同文化象徵的塑造。1985 年 6 月，歐盟委員會制定了聯盟共同的盟旗、盟歌及護照，正式開啟了創造歐洲象徵符號的第一步。盟旗的設計以蔚藍為底色，中間由 12 顆金色的星星環繞成一個圓；盟歌則採用歐洲人耳熟能詳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即《歡樂頌》)；護照也使用統一的外形與設計，只是標誌著不同國家的名稱。以盟旗的設計為例，它看似簡單卻包含了深厚的文化象徵涵意，試圖體現共同的歐洲文化認同。2. 創建新的歐洲媒介系統。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後期以來，歐洲各國協同推出一列系「媒介計畫」，如「歐洲電影節」、「視聽尤里卡計畫」、「無疆界計畫」等，目的就是創造一個歐洲視聽空間，從而打破國家間有形的界限，借助信息的共享幫助歐洲人認識到他們在諸多領域分享的共同命運。這樣，歐洲文化認同易於演化成一種親歷的體驗、情感和日常事物，與民族國家及民族認同相互競爭，甚至替代他們。第三，重視大眾教育的作用。教育是培養歐洲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對易於接受新思想的歐洲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如此。例如，歐洲於 1996 年推出「蘇格拉底計畫」、「列奧那多計畫」，前者是促進歐洲高等教育交流，後者是對歐洲青年進行培訓。²⁶

第四，歐洲認同既是集體層面上的歐洲整體自我認同，也是個人層面上個體歐洲人的社會認同，而這兩者的形成均與「他者」的存在緊密相關，美國就是其一。中國學者龐琴在「反美主義在當代歐洲認同形成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歐洲認同是歐洲區域整合深入發展的關鍵，沒有歐洲認同，歐洲聯盟僅是一個利益和目標的共同體。歐洲認同作為一種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其形成是以「他者」的存在為前提的。伊拉克戰爭以來歐洲持續高漲的反美主義，使歐洲人認定美國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上的「他者」，這對歐洲認同的建立產生了積極的作用。²⁷

龐琴在文中指出，當代歐洲反美主義繼承了戰後反美主義對美國歷史文化的批判，並進一步發展。一是對美國文化的抵制，炫耀歷史遺留下來的歐洲文化優越論。這種觀點在歐洲上層文化精英中有相當市場。他們認為美國文化過於商業化、缺乏歐洲文化的精緻和品味。二是對美國社會本身的不認同，主要包括宗教、道德、福利和教育制度等方面。三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和行為的反對。龐琴在文中指出，以上三類反美主義分別從文化、社會經濟和外交角度，展現了一個與歐洲不同的「他者」—當代美國。美國是一個沒有文化品味、福利、教育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完全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推行霸權主義，不顧世界環境和人權，是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國家。通過這個「他者」的鏡子，歐洲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他們與美國這個「他者」的不同之處：他們更有歷史文化內涵，社會

²⁵ 張旭鵬，「文化認同理論與歐洲一體化」，《歐洲研究》，第 4 期（2004 年），頁 66。

²⁶ 同上註，頁 74-77。

²⁷ 龐琴，「反美主義在當代歐洲認同形成中的作用」，《現代國際關係》，第 12 期（2007 年），頁 46。

內部更加平等並且關心全球環境的愛護世界和平。這是歐洲人與「他者」相區別的個性，同時也是歐洲人的共性。²⁸

第五，歐洲區域整合發展到今天，歐盟已經形成政治經濟的全方位聯盟，更是一個文化和理念共同體，而歐洲認同的建構在其間起到關鍵因素。那麼，如何解讀並建構一種共同的歐洲認同呢？中國學者張生祥在「對歐洲認同的幾點思考」一文中指出，歐洲認同應該是多樣性歐洲民族認同的統一；歐洲認同是一種建構「他者」並與其區別開來的進程；歐洲認同是「大歐洲」觀念與民族意識矛盾而又互動的結果。²⁹

第六，英國學者曼納斯 (Ian Manners) 於 2000 年提出的「規範性力量歐洲」，是繼 1972 年迪歇納 (François Duchêne) 提出「民事力量歐洲」之後的又一代表性理論建構。所謂規範性力量，是指一種既不單純依靠經濟手段也不單純依靠軍事手段，而是通過思想和觀念來發揮作用的特殊行為體。規範性力量的目的不僅是要塑造其他行為體的價值觀，而且要依靠規範本身來完成，否則需要軍事裝備或經濟動機來實現的事情。經過 50 年的發展，歐盟已經建立起一個包括五個核心規範和四個次要規範的規範性基礎，它們是和平、自由、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社會團結、禁止歧視、可持續發展和善治。³⁰ 中國學者吉磊在「話語行動與身分建構：規範性力量歐洲的反思」一文中，以建構主義的概念出發，認為「規範性力量歐洲」的理論問題，源自於解決冷戰後歐盟身分認同，對外和對內兩個向度的深刻危機。³¹

從上述的論證可以發現，在純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論述，中國學者主要是採取建構主義途徑，認為透過區域整合的措施可以達到認同的目的，但也指出整合措施仍存在諸多不確因素，減緩了歐洲認同建構的成效。

另外，中國學者李明在「後功能主義理論與歐洲一體化」一文中，則援引學者霍克 (Liesbet Hooghe) 和馬科斯 (Gary Marks) 提出的「後功能主義理論」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強調了解歐洲區域整合必須從研究歐盟的大眾意見和政黨政治入手。該文強調，後功能主義以認同因素，解釋了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歐盟的全民公決、政黨衝突等新現象，並強調與精英集團相比，認同因素是歐洲大眾對於整合態度不可忽視的層面。³²

二、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

加入制度層面的認同觀點，強調了歐盟制度建設的作用與角色，中國學者范勇鵬在「歐洲認同的形成—一個新制度主義的解釋」一文，就主張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范勇鵬在該文中提及，過往眾多文獻在探討歐洲認同的形成時，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取徑，但是關於制度因素在認同建構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還沒有引起多數研究者的關注。

²⁸ 龐琴，「反美主義在當代歐洲認同形成中的作用」，前引文，頁 47。

²⁹ 張生祥，「對歐洲認同的幾點思考」，《歐洲研究》，第 4 期（2009 年），頁 33-34。

³⁰ 張茗，「規範性力量歐洲：理論、現實或歐邦邦？」，《歐洲研究》，第 5 期（2008 年），頁 3-5。

³¹ 吉磊，「話語行動與身分建構：規範性力量歐洲的反思」，《歐洲研究》，第 2 期（2010 年），頁 33。

³² 李明，「後功能主義理論與歐洲一體化」，前引文，頁 33-34。

范勇鵬認為，歐洲區域整合過程建立起來的制度和機構，正全方位地影響到歐洲公民的日常生活，深入地塑造和改變他們的利益形成和偏好選擇。范勇鵬指出，歐盟的制度建設和通過象徵體系(如歐洲日、歐盟、盟旗等象徵意義的符號體系)的暗示，行政、司法參與和民主政治實踐，對公民生活經歷的影響，對文化化和價值觀的塑造，培育超國家精英階層以影響公共觀念等方式，促進了歐洲認同的形成。范勇鵬強調，通過上述諸種方式，歐盟的制度和機構對歐洲認同的建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³³范勇鵬該文的結論指出，基於功利計算的理性選擇是人類行為的基本邏輯，因而不可能排除利益因素的影響。故作者認為利益因素與制度因素共同決定了歐洲認同的形成，隨著經濟區域整合向政治區域整合的發展，利益因素的影響力在下降，制度因素的影響力開始表現出來。³⁴

再如，2008年1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氣候政策立法建議，並於12月分別獲得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批准。中國學者崔宏偉在「歐盟氣候新政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推動」一文中，解釋了歐盟推出歐洲氣候新政的主要目的。崔宏偉指出，歐盟氣候新政策不僅旨在通過制度和技術創新，解決能源供應、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等一系列歐洲長期存在的老問題，而且希望通過賦予歐盟機構更大的權力，依靠歐盟層面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決策和超國家監管，實現歐洲社會和生態的進步和文明化，並藉此鞏固歐洲認同建構的基礎，增強歐盟的合法性和凝聚効力，推動歐洲區域整合深入發展。歐盟氣候政策的主導價值是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已成為歐盟建構歐洲認同的核心要素之一。³⁵歐盟在內部氣候變化政策和國際氣候協議方面的成效，已經成為歐洲整合的附加值。但是，崔宏偉在該文中也指出，歐盟氣候新政在今後實踐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例如歐洲經濟復蘇的緩慢進程、氣候新政遭遇內部利益集團壓力和歐盟政治體制限制等，其最終成效將取決於歐盟成員國的政治意願，在與氣候有關的政策領域達成一致的規則並共享主權。³⁶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論述，中國學者是以建構主義為主，加入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觀點，比較偏重制度的整合是促進認同的主要因素。

三、權力/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

加入權力層面的認同觀點，強調了歐盟作為實質力量所能發揮的功能，中國學者朱立群在「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怎麼認識歐洲的力量？該文指出，歐盟是國際體系中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一個重要行為體，是一個擁有全面力量的世界行為體，在從規範與合法性角度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和影響力。文中也指出，歐盟藉由外交資源和能力、經濟外交能力、軍事能力，發揮了對外發展合作援助、人道主義援

助、促進民主與人權項目、進行人道救援維和危機處理任務等實質巨大力量。³⁷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權力/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論述，中國學者是以建構主義出發，加入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點，強調歐盟在當前國際體系所能發揮舉足重的角色。

四、權力/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

加入權力、制度層面的認同觀點，強調了歐洲認同在建構過程中，是權力、制度及認同各種因素互相作用影響了歐洲區域整合。中國學者彭云、劉偉在「合作性世界秩序：歐盟的全球治理構想」一文中強調，歐盟在歐洲區域整合過程的實踐中，始終秉持以合作和諒解的精神尋求聯合，使一種新的合作文化得以產生。歐洲人認同這種新的文化，並信任其在國際事務中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以此為基礎，歐盟主張通過非軍事的，特別是社會經濟手段以及法律化和規則化機制化解衝突，實現多國合作，認為這是積極轉向國際穩定政策的重要前提，從而形成了歐盟的全球治理構想—合作性秩序。³⁸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權力/制度/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論述，中國學者是以建構主義出發，加入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點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觀點，強調歐盟在當前國際體系所能發揮舉足重的角色，以及最終對歐洲認同的助益。

五、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因應論述

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究竟抱持何種態度，又如何因應？例如，中國學者馮紹雷在「中國可以從歐洲一體化中學習什麼？—從地區比較層面的一種思考」一文中指出，應該將地區合作的目標看成是一個與這一地區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與福祉穩定緊密相關的重要保障，看作是一個需要為之作出長期努力和巨大犧牲的社會理想。其次，歐洲區域整合過程中展現的與時俱進、適時因應的靈活態度，值得關注。第三，如果國家政治統一和區域合作進程，是具有高度內在關聯性的一個過程，那麼歐洲區域整合可以留給國家、特別是東亞尚未統一國家的歷史經驗就非常值得觀注。東亞國家如何在推進國家統一的同時，兼顧維持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同時如何運用地區整合的力量來推進國家的統一，將這兩個過程辯證地結合起來，是應慎重考慮的。馮紹雷該文也指出，中國和其他東亞人民所特有的集體意識和儒家文化中蘊含的樂天主義精神，這種樂天主義以現世關注為重點，以和諧穩定與合作為目標，以化解和疏導而不是暴力壓制為方法，此種傳統精神對未來的東亞區域整合有其助益。³⁹

再如，相對於「民事力量歐洲」和「軍事力量歐洲」，英國學者曼納斯 (Ian Manners)於 2000 年提出的「規範性力量歐洲」，將其作為歐盟的身分及其在國際事務中角色的新定位。中國學者洪郵生在「規範性力量歐洲與歐盟對華外交」一

³³ 范勇鵬，「歐洲認同的形成：一個新制度主義的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8 年），頁 52-53。

³⁴ 同上註，頁 59。

³⁵ 崔宏偉，「歐盟氣候新政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推動」，《歐洲研究》，第 6 期（2010 年），頁 37-43。

³⁶ 崔宏偉，「歐盟氣候新政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推動」，《歐洲研究》，第 6 期（2010 年），頁 41-43。

³⁷ 朱立群，「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2008 年），頁 16-20。

³⁸ 彭云、劉偉，「合作性世界秩序：歐盟的全球治理構想」，《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1 期（2003 年），頁 74。

³⁹ 馮紹雷，「中國可以從歐洲一體化中學習什麼？—從地區比較層面的一種思考」，《歐洲研究》，第 6 期（2007 年），頁 8-11。

文中指出，「規範性力量歐洲」是歐洲人對他們的先哲提出的政治價值觀的繼承，以及他們在歐洲區域整合實踐中新觀念的總結，同時也打上歐洲歷史和現實政治文化語境的烙印。洪郵生在該文中指出，通過分析歐盟對華人權外交及其成員國的價值觀外交，「歐洲規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歐盟以自己認定的方式將其向世界推廣，將「歐洲規範」、「歐洲價值觀」等同於所謂「普世規範」、「普世價值」而強加於人，這在理論上是不合邏輯的，在實踐上是難以行得通的。該文也指出，如果歐洲將它的「規範力量」當作「普世」的意識型態工具而企圖改造或取代其他意識型態，那麼它便具有更為強烈的政治取向，對中國來說則更具有挑畔性，中國是不會接受的。⁴⁰

再如，對於當前歐盟提出的全球治理構想—「合作性世界秩序」，中國學者彭云、劉偉在「合作性世界秩序：歐盟的全球性治理構想」一文中指出，當歐盟提出的全球治理構想—「合作性世界秩序」，倡導多邊主義、尊重全球制度、承認文化多樣性，與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戰略有明顯區別，但是二者在本質上差別不大。「合作性世界秩序」體現的是一種「規則霸權」，表現出一種軟性壓力。彭云、劉偉指出，這種「規則霸權」表現為一種精緻的控制權，它以軟硬兼施、任你選擇的方式，迫使弱小國家不得不接受大國強國制定的規則或提出的條件，從而在長遠來看實現後者的控制目的。⁴¹

再如，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對歐公共外交，至於成效如何呢？中國學者宋黎磊、王義桅在「中國對歐公共外交：目標、進展與挑戰」一文中指出，如果歐洲國家一味指責和干涉中國內政，必將會繼續損害中國對歐公共外交—廣大民眾的善意，甚至引發中國民眾對歐洲民族主義情緒的濫觴。正如有些學者所擔心的，如果中國運用軟體力戰略提升自身形象的努力始終得不到回應，並繼續被歐洲視為國際社會中的異質體，中國也許會挑戰國際社會的規範性進程。換言之，自詡為「規範性力量」的歐盟如果將自身的行為標準擴展到國際體系，按照自己的標準重新界定國際規範，那麼中國也會力圖改變某些國際規範以實現其公共外交的初衷。⁴²

再如，中國如何看待歐盟這股力量？中國學者朱立群在「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一文中指出，中國更多地認同歐盟的重要國際地位，以及歐洲模式對於國際政治和世界發展的積極意義。但是中國對歐洲政策始終強調在重視歐盟的同時，也重視發展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係。這不僅緣於歐盟對外關係領域的政府間合作性質，更關鍵的是因為歐盟對華決策模式上的「雙軌制」特徵，即在政治安全領域以各成員國對華政策為主和歐盟整體對華政策為輔的狀況，導致中國同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仍然是中歐關係的重心。⁴³

陸、理論說明的不足處(代結論)

從本文的論述可以得知，根據蒐集的中國學術界論文顯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包括了歐盟公民權與歐洲認同、歐洲社會議題與歐洲認同、歐洲文化認同、反義主義與歐洲認同、規範性力量歐洲與歐洲認同、歐盟制度設計對歐洲認同影響、歐洲氣候新政策對歐洲認同影響、歐盟實質力量對歐洲認同影響，以及歐盟全球治理對歐洲認同影響。

綜上所述，中國學者認知的歐洲認同仍然是有「條件說」，一方面中國肯定歐洲區域整合獲致的結果，強調區域整合過程中展現的與時俱進、適時因應的靈活態度，更可作為東亞尚未統一國家的歷史借鏡經驗。另一方面，中國也警惕如果歐洲將其「規範性力量歐洲」作為「普世」的意識型態工具，而企圖改造或取代其他意識型態，那麼它便具有更為強烈的政治取向，中國是不會接受的。中國學者甚至直指，歐盟提出的全球治理構想—「合作性世界秩序」與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戰略有明顯區別，但是二者在本質上差別不大。「合作性世界秩序」體現的是一種「規則霸權」，表現為一種精緻的控制權，迫使弱小國家不得不接受大國強國制定的規則或提出的條件。而這就說明了中國學者認知的歐洲認同，仍然潛藏了軟權力的施展。

同時，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對歐洲區域整合的認同論述，都是純粹認同觀點中的認同觀點，援引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建構主義，少數論文援引的研究途徑則為新制度主義、後功能主義。然而採用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及建構主義，兼具三者優點的折衷主義則顯然不多。

事實上，在歐洲區域整合的過程，要建立歐洲的文化認同，筆者建議觀察的對象可以集中在歐洲共享的符號(如歐盟盟旗、盟歌、歐元、節日等)、事件、集體記憶等，然而不論援引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者建構主義這些鉅型國際關係理論，較難在實際分析上進行微觀細緻的論述。對此，筆者建議國際關係學界可以跨領域吸取理論養分，例如引用文化研究理論、符號學理論等，作為微觀的論述取徑，相信更可以掌握歐洲庶民眼中的歐洲認同，藉此補足長期來由歐洲菁英階層視域出發的歐洲認同。

其次，建構主義將歐盟制度視為一個正在形成的話語體系。事實上，話語的表述就是一定的權力關係。對此，筆者建議國際關係學界可以借用傅科(Michel Foucault)有關話語權力分析。如同傅科觀察的現代社會中，社會和政府機構就是依靠掌握話語知識來掌握權力，同樣的要觀察歐盟如何發揮實質權力，也可以援引傅科的話語權力分析，從而可以宏觀地掌握歐盟建構的國際話語權。

⁴⁰ 洪郵生，「規範性力量歐洲與歐盟對華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10年），頁52、65。

⁴¹ 彭云、劉偉，「合作性世界秩序：歐盟的全球性治理構想」，前引文，頁74。

⁴² 宋黎磊、王義桅，「中國對歐公共外交：目標、進展與挑戰」，《現代國際關係》，第8期（2011年），頁47-49。

⁴³ 朱立群，「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8年），頁23。

參考書目

- Haas, Ernst B.,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ity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 4 (1969), pp. 161-166.
- Hall, Stuart 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
- March , J. G. and J. P. Olse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Vol. 9, No. 3 (1996) , pp. 247-264.
- Peters, B. Guy,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 Risse, Thomas,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http://www.fu-berlin.de/atasp>.
-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1 (Jan., 1992), pp. 55-76;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田德文,「論社會層面上的歐洲認同建構」,《歐洲研究》,第1期(2008年),頁43-58。
- 吉磊,「話語行動與身分建構:規範性力量歐洲的反思」,《歐洲研究》,第2期(2010年),頁33-45。
- 朱立群,「歐盟是個什麼樣的力量?」,《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8年),頁16-23。
- 宋黎磊、王義桅,「中國對歐公共外交:目標、進展與挑戰」,《現代國際關係》,第8期(2011年),頁44-51。
- 李明明,「建構主義的歐洲一體化理論探析」,《歐洲研究》,第3期(2003年),頁48-58。
- 李明明,「後功能主義理論與歐洲一體化」,《歐洲研究》,第4期(2009年),頁33-45。
- 李明明,「試析一體化進程中的歐洲認同」,《現代國際關係》,第7期(2003年),頁19-23。
- 李明明,「試析歐洲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歐洲研究》,第3期(2005年),頁80-96。
- 李明明,「歐盟認同與歐盟制度建設:一個互構進程」,《外交評論》,總第98期(2007年10月),頁30-36。

- 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洪郵生,「規範性力量歐洲與歐盟對華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10年),頁52-65。
- 范勇鵬,「歐洲認同的形成:一個新制度主義的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2008年),頁48-59。
- 馬勝利,「歐盟公民權與歐洲認同」,《歐洲研究》,第1期(2008年),頁30-42。
- 崔宏偉,「歐盟氣候新政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推動」,《歐洲研究》,第6期(2010年),頁32-43。
- 張生祥,「對歐洲認同的幾點思考」,《歐洲研究》,第3期(2005年),頁111-118。
- 張旭鵬,「文化認同理論與歐洲一體化」,《歐洲研究》,第4期(2004年),頁66-77。
- 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
- 張茗,「規範性力量歐洲:理論、現實或歐托邦?」,《歐洲研究》,第5期(2008年),頁33-45。
-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8卷9期(1999年9月),頁93-109。
- 陳玉剛,「歐洲制憲與歐洲一體化:國際關係的解讀」,《歐洲》,第5期(2002年),頁12~22。
- 彭云、劉偉,「合作性世界秩序:歐盟的全球治理構想」,《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1期(2003年),頁74-79。
- 童世駿、曹衛東編,《老歐洲、新歐洲:911以來歐洲復興思想對英美單邊主義的批判》(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馮紹雷,「中國可以從歐洲一體化中學習什麼?—從地區比較層面的一種思考」,《歐洲研究》,第6期(2007年),頁1-11。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36卷12期(1997年12月),頁1-22。
- 龐琴,「反美主義在當代歐洲認同形成中的作用」,《現代國際關係》,第12期(2007年),頁46-50。